

悲鳴嶼：在《車諾比的悲鳴》中聽見臺灣的回音與共鳴

成大歷史學系/黃李森

「東尼，你有多了解車諾比？」

「那裡發生大爆炸、核熔毀，大量放射性煙塵飄過歐洲，而且他們到現在還沒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「你準備好踏上這趟旅程了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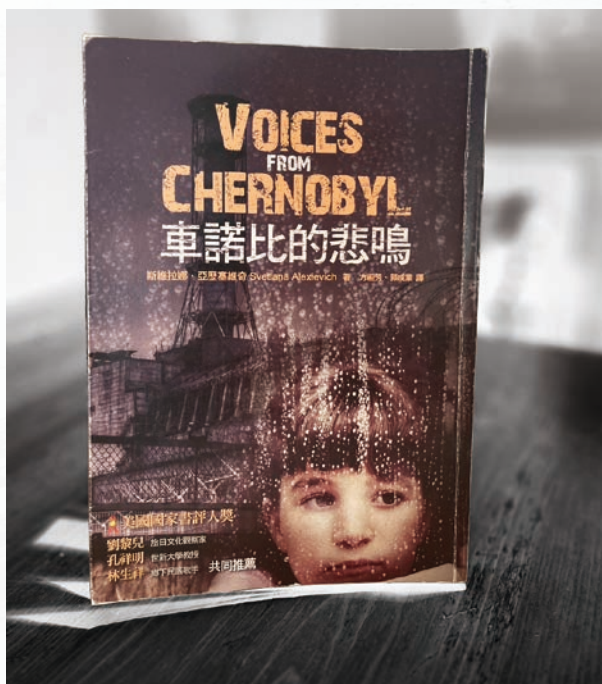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不知道，我會不會看到長毛的鱒魚？三頭狼或是…」¹

已故的廚師作家安東尼·波登(Anthony Bourdain, 1956-2018)曾在其知名旅遊節目《波登不設限》中到訪烏克蘭，這是他與好友即將啟程前往車諾比前的對話，對話席間他們猛灌著伏特加，一方面是本身就特別嗜酒，另一方面，則是藉著酒精來壓抑對未

知與危險的恐懼。伏特加不只是飲品，更是一種心理防線，在面對一場災難遺跡之前，為自己壯膽的方式。

車諾比是什麼樣的地方？歷史課本中它被簡單地描述為1986年發生核災的地點……然後呢？課本並沒有告訴我們，那些生活在當地的人們後來怎麼了。以我們對核災的基本理解來看，這種因輻射外洩所引發的災難，在我們有生之年恐怕都難以完全解決。畢竟，連醫院的X光室都會張貼警告提醒輻射的風險，那麼，直接面對核災的人民，他們的處境又是如何？波登喝著伏特加的畫面，不禁讓人想起《車諾比的悲鳴》裡那些反覆出現的場景：不論是清理現場的工人、身處其中的軍人，還是無辜的百姓，面對災難，他們所能做的，往往是再多喝一口伏特加——畢竟他們曾被教導喝伏特加可以幫助抵抗輻射。

這本《車諾比的悲鳴》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·亞歷塞維奇(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)歷時多年訪談多位車諾比核災受難者後寫成的紀實文學。²它不是單純記錄事件本身，而是透過一個個親身經歷者的聲音，呈現出災後那些難以被歷史課本書寫的日常生活與悲鳴。



1 Directed by Zero Point Zero Production, Presented by Anthony Bourdain, Ukraine - Anthony Bourdain: No Reservations, US: Travel Channel, 2011.

2 斯維拉娜·亞歷塞維奇，《車諾比的悲鳴》，臺北：馥林文化，2011。



一、鳴聲的開端：重讀與當下的共鳴

1986年4月26日，車諾比核災。

2022年2月24日，俄烏戰爭爆發。

我第一次讀《車諾比的悲鳴》，其實是出於很單純的理由，一方面是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吸引；另一方面也因為它篇幅不長，感覺能夠迅速讀完。然而，我仍記得翻閱它時的沉重心情，書的重量不在紙張，而在故事本身，沉重得與它輕薄的外表形成強烈對比。這次重讀，並不是為了更深入了解核災或歷史，而是因為近年來戰爭的陰影再次讓烏克蘭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。這個焦點穿越了時空與地理，也在我們這座島嶼國家響起了某種回音。

我出生於20世紀末、成長於21世紀，對車諾比核災的認識其實相當有限。「烏克蘭」這個國家，在我們這座島嶼上也曾經只是課本裡的一個名詞。閱讀這本書，不僅是回望一場歷史災難，更像是一種凝視，凝視一場至今仍在延燒的困局。這麼說好了，同樣是小國面對強權的壓力與武力威脅，烏克蘭曾是蘇聯的一部分，而我們則緊鄰當今的世界強權——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不同的是，烏克蘭已經真實地承受了飛彈襲擊；而我們，還在面對隔壁的飛彈威脅。

至於核能，我們尚未經歷過核電廠爆炸的災難（希望永遠不要），相鄰的另一個友好國家，在十幾年前為我們示範了核災的危機，而我們臺灣關於核電的討論卻從未停歇，擁核與反核的爭論像是一場永無止息的互角。為什麼這個遙遠的國度，總能與我們的島嶼產生如此強烈的共鳴？或許，是因為我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，在恐懼、傷痛中與未來對話。

二、地緣與災難交會處：在烏克蘭、福島與中國之間游移

2011年3月11日，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災。不同的是，福島被視為天災所致，而車諾比則是一場人禍，兩者是歷史上唯二被評為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最高等級（第七級）的重大核災。綜觀全球史，日本或許是經歷最多「核能」災難的國家。

臺灣與日本同處在板塊交界帶，是地震頻繁的高風險區域。然而，我們爭論福島食品是否應該進口時，卻時常忽略臺灣核電廠的風險可是在全球名列前茅。雖然政府機關與核能科學家們設計了各項防災機制，但回頭看看車諾比與人類的歷史經驗，當真正的核災來臨時，理性、科學與務實的應對能發揮多大的作用？

車諾比核災發生前，核能曾被視為人類邁向未來烏托邦的希望，但這場災難讓這個夢想瞬間破滅。這本書的受訪者不約而同地回憶，災變初期當局一方面灌輸「沒事，那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陰謀」的說法，一方面卻動員軍隊封鎖區域、清除被輻射污染的土地與物資。這種矛盾、掩飾式的太平景象，是否讓人感到熟悉？畢竟，它其實不是多久以前的事。

2019年中國武漢爆發COVID-19疫情，最初的回應也是消息封鎖、否認風險、強調穩定。直到病毒跨越邊界並擴散到全球，整個世界才真正意識到事態的嚴重。如今，還有多少人記得世界衛生組織在記者會上的荒腔走板？我們作為距離疫情源頭最近的國家之一，靠著迅速的邊境檢疫、口罩實名制與每日記者會，一度成為2020年少數能維持正常生活的地區。然而，當病毒終究突破了防線，三級警戒下的恐慌與混亂，又有多少人記得我們曾是「防疫模範生」？又有多少人，會將矛頭指向病毒的源頭？

這座島嶼的悲鳴，始終被更大的聲音掩蓋。

三、島嶼視角：臺灣的沉默與無力如何被說出？

重新翻閱這本書，讓我想起口述歷史這門學問，作為歷史學重要的訓練之一，它讓我有機會走入田野，試圖書寫那些未曾親身經歷過的生活，雖然我接觸的多是關於常民記憶與娛樂生活。即便需要大量史料來補充與驗證口述的真實性，對話仍是一條通往歷史深處的途徑。相比之下，天災、戰爭或政治迫害等經歷的口述，我至今仍未曾實地訪談。但在閱讀臺灣的許多訪談資料時，特別是像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，那些沉重且難以咀嚼的畫面——直面屠殺的當事者敘述皮膚、血肉被鐵線勾到血肉模糊，或是親眼見到某位友人的屍體——竟能以如此平靜的文字呈現，彷彿苦難成了日常的一部分。³

「輻射物質最可怕的是看不見，無色、無味、無聲、無形，遭輻射污染的世界表面上是很和平的世界。」許多受訪的車諾比災民，經歷過世界大戰、冷戰或共產極權時期，他們曾為戰爭做過各種準備，建造防空洞、訓練躲避砲火、儲備糧食，但輻射的威脅卻潛藏於每日生活的細節中：水、麵包、空氣、牆壁，每一樣都可能有毒。他們記得戰爭的聲音：爆炸、尖叫與死亡，卻無法用言語描述車諾比帶來的無聲卻滲透一切的恐懼與無力。

這樣的無聲恐懼，不也正映照在我們島嶼的處境？

我們明知海的對岸是敵對勢力，卻在手機與社群媒體上，日復一日滑過來自抖音、小紅書、甚至各省美食與網紅日常的短影音。你說要禁止它們嗎？可那些內容五光十色，帶來的是歡笑與娛樂；你說那是滲透嗎？但他們也用中文歌唱，也說著我們聽得懂的語言，這種情境該如何說明？

遭到砲火攻擊，我們可能活不過一秒，而在車諾比、福島的災民，是提早知道未來某一天可能因為某種基因突變、腫瘤死去。當資訊被有意的傳播者操控，當事實被包裝、稀釋，沉默與遺忘就悄悄取代了真相，這不就是另一場形式的核災嗎？只是我們從生理上的威脅，轉換成心理、國際間的威嚇，沒有輻射，卻一樣籠罩著恐懼與麻木。災難不再爆炸式地來臨，而是潛移默化地讓我們在平靜中失去警覺，在沉默中忘卻疼痛。

3 許雪姬、方惠芳訪問，吳美慧等紀錄，《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5。

四、我們的悲鳴嶼：在世界的灰燼中尋找出口

重新閱讀災難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卻總讓人難以迴避，因為災難從未真正遠離。有人演繹了未來給我們看，有人展示了過去讓我們瞧，而我們身處此刻，不斷以不同形式重演著歷史。正如桑塔亞納（George Santayana，1863-1952）所言：「遺忘歷史的人，註定會重蹈覆轍。」

近來，在我們的島嶼上出現了令人錯愕的荒誕行徑，納粹禮再次出現於公共空間。這本該是人類道德的底線，是不該再重蹈覆轍的歷史，卻在今日的我們眼前重現。納粹大屠殺期間，奧斯威辛集中營附近人家的院子裡，草莓上總覆著一層灰，那其實是焚化爐裡飄出的猶太人骨灰。⁴而《車諾比的悲鳴》中，核災倖存者與清理人，回憶核災後所見的景象，花草樹木一如日常，風和日麗、莓果茂盛，卻沒人敢去採集與食用，因為美麗的表象下潛藏著無法見光的毒性。

我們可以看見成大的學生在Dcard與Threads上發起政治活動的聲援行動，也能看到湯德章紀念公園、國立臺灣文學館作為政治議題的集會場域，將校園、博物館作為公眾議題的對話空間。從網際網路、社群媒體到街頭巷尾，對立與呼籲每一刻都在上演。這也表示當我們走入學校、課堂，甚至網路上發聲時，我們不只是學生，也是這座島嶼的一份子。我們學會關心島外的戰爭，也不能忽視身邊的沉默。我們學習工程與技術，也該理解科技與倫理的界線；我們閱讀人文與社會，也該練習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定位。

這篇文章寫在4月26日，恰逢車諾比核災39週年，我們這座島嶼正處在公開且激烈的政治攻防中，這不是歷史課本裡的故事，而是我們的日常。遠方的悲鳴似乎與我們處在不同的頻率，但無論從世界局勢、政治遭遇來看，歷史未曾遠去，它只是換了一張面孔重返人間。而我們，是否願意讓自己的聲音也成為一種迴響，不只是為自己，也為這座島嶼的未來。

4 房慧真，《草莓與灰燼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，2021），頁251-259。